

热历史

司马迁的“实录”精神

刘雅婧 沈章明

《史记》备受后人称赞，东汉班固称其“文直”“事核”“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”，近人鲁迅称赞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赞其为“实录”，旨在颂扬它的“质”；称其为“绝唱”，意在推崇它的“文”。

《史记》记录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。司马迁以一己之力撰写三千年通史，任务相当艰巨。他所面临的头道难题，就是如何搜集与选择史料。

文字史料最常见，也最芜杂。司马迁广泛阅读史料，并且作出细致分析，认为用古文书写的史料最可靠。在撰写《仲尼弟子列传》时，他虽然采信了当时学者的观点，认为孔子有70多位弟子，但只详细介绍了出现在古文资料中的35人。

求真为司马迁的信条。在出任史官并且准备写作《史记》前，他就开始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。20岁时，司马迁从洛阳南下，渡淮河，过长江，窥九嶷，浮沅、湘，南登庐山，俯瞰大禹曾经疏浚过的九江。之后沿江而下，又来到今天改称绍兴的会稽，考察大湫，探访禹穴。随后，“上姑苏，观五湖”，渡淮河，临泗水、汶水、济水。考察完山东半岛，又在西归的过程中走访黄河、漯河、洛渠。

司马迁热衷于调查研究，不只是为了寻找和选择史料，还为了准确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探寻历史的真相。

“想见其为人”，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最高褒奖，也是他调查研究的驱动力。早年阅读《论语弟子籍》和《论语弟子问》时，他就非常仰慕孔子。哲人已逝，相见无方，要表达“心向往之”的热诚，最好的办法是实地考察，追踪孔子行迹。

司马迁还前往刘邦等人的出生地与聚众起义地，走访彭城、沛、丰、碭等地，了解汉初君臣的故事。在淮阴调查时，当地人告诉他：韩信时刻以富贵为念，始终相信自己能大富大贵，“其母死，贫无以葬，然乃行营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万家”。为了验证传言真伪，司马迁特意去韩信



连环画《司马迁》(资料图)

母亲的墓地调查，“视其母冢，良然”。

这个调查结果对《史记》写作产生重要影响。司马迁以韩信的利欲心为线索，解读相关史料，写出了《淮阴侯列传》。在这部传记的前半部分，司马迁记录了韩信初拜大将时进献给刘邦的计策。其中一条就是，要想服众，必须“以天下城邑封功臣”。随后，记录的是韩信敦请刘邦封张耳为赵王的故事。张耳本来是刘邦派来的副将，韩信在迫使燕王归附之后，请封张耳为镇抚燕国的赵王。这样，既去除了刘邦派来的制衡者，又把自己变成了“造王者”。

刘邦统一天下后，采用出其不意的手段，夺了韩信的兵权，将其徙封为楚王。后来，又改封淮阴侯。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激怒韩信。韩信顾不了那么多，最终谋反事泄、身死族灭。临刑前，韩信慨叹“梅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”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直接再现了韩信的悲剧人生，又间接表达出自己的立场。为了进一步表明立场，司马迁还在论赞部分直接批评韩信，认为他本可以用功勋来换取富贵，成为汉代的周公，却自矜其功劳与才能，不懂得谦让，汲汲于功名富贵，最终被夷灭宗族，“不亦宜乎”。

如果司马迁不作调查研究，就不可能搜集到这么多史料，更不可能如此巧妙地剪裁与组织史料，《淮阴侯列传》《屈原贾生列传》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《孔子世家》《五帝本纪》就不会是目前这种写法，其思想性、艺术性也会大受影响。

《淮阴侯列传》是实录，也是悲歌，称其为“无韵之离骚”并不为过。《史记》的其他部分也一样，处处体现实录精神，又散发出迷人的艺术气质。

《淮阴侯列传》是实录，也是悲歌，称其为“无韵之离骚”并不为过。《史记》的其他部分也一样，处处体现实录精神，又散发出迷人的艺术气质。

《留侯世家》是另一个例证。传主张良是个谋士，“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外”，谋划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如果仅仅阅读关于他的史料，可能会将其想象成魁梧奇伟之士。司马迁也曾这样猜测过，直到后来得到张良的画像，才知道原来张良“状貌如妇人好女”，非但不魁梧，反而很柔弱。

司马迁刻意运用种种对比，烘托张良与韩信不同的悲喜人生，制造强烈的艺术张力。这是客观再现，也是有意展示。司马迁凭借调查研究所得，巧妙地选择与组织可信史料，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可谓“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读者在司马迁的引导之下，得以触摸到历史的棱角，感受到潮流浩浩向前的力量，领略华夏山川风貌，领略历史人物风采。

《解放日报》

古事汇

越是艰难处 越是修心时

张燕峰

范仲淹幼年丧父，被迫跟着母亲改嫁到朱家。朱家是个大家庭，孩子们对范仲淹不友好，常常施以白眼，让他受尽歧视和冷遇。十几岁的时候，范仲淹选择到寺庙里去发奋读书。他把自己关在屋内，足不出户，手不释卷，通宵达旦地读书。很多同学从家里带来美味佳肴，范仲淹却每天只煮一锅粥，冷却之后用刀分成四块，早晚各取两块为食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断齋画粥”的故事。

在食不果腹、衣不御寒的艰苦日子里，是什么支撑着这个少年日复一日毫无松懈地苦读呢？范仲淹后来在《范文正公文集》里曾提到这段求学的时光。他说：“每天只要闭上眼睛，寄人篱下的委屈就历历在目，就增加了我刻苦读书的动力和顽强拼搏的勇气，自然忘却了饥渴和寒凉。”正是因为不断回味往事，才激发了自己的上进之心和摆脱现状的强大动力，才使他有了从不懈怠的实际行动。27岁那年，范仲淹一举通过了科考。

“越是艰难处，越是修心时。”环境越糟糕，生活越艰难，我们越需要修炼、修正、涵养自己的心灵。无论面对怎样的诱惑，我们都要不忘初心，牢记家国情怀、羞耻之心和是非之心，恪守做人的准则，自觉抵制诱惑。唯如此，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大写的人，才是一个顶天立地受人尊敬的人，才是一个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的高尚的人。（《绥化日报》）

生活史

蝉：一朝羽化自在鸣

赵中振

《西游记》的文化背景由佛、道、儒的元素结合而成。唐僧原本是如来佛祖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。每次遇到危险，唐僧都能够化险为夷，最终取到了真经，又成功回到了灵山。蝉有重生和长生的含义，这也符合传播在各路妖精之间“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”的传闻。

“金蝉脱壳”在道教里还是一个炼丹术语，通过铅汞炼丹产生的“圣胎”，历经三百天脱胎而出。这和《西游记》里唐僧取到真经、修成正果以后成佛的结局相合。

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意象。在古人眼中，蝉的幼虫破土而出，具有一种脱胎换骨的高洁气质，象征着“复活”与“重生”。

《庄子》里记载了“承蜩”，蜩和知了是同一物，“知了”急读为蜩。根据考古发现，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便有了玉蝉等物品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有蝉的纹饰。

古代的玉蝉有三大功能。第一是挂在腰间作为装饰品，称为佩蝉。第二是镶嵌在帽子中间，用来正衣冠，名为冠蝉。第三是作为玉蛤类陪葬玉器，放在死者口中以求精神复生。

蝉的腹部有一对鸣器，由镜膜和鼓膜组成，有了鸣器，蝉才能鸣叫，鸣器只有雄性的蝉才有。蝉夜伏昼鸣，夜里睡觉，白天歌唱，而且天越热，叫得越欢，堪为精力旺盛的“暑期合唱团”。到了秋天，天气一凉，蝉就不叫了，因此有了成语“噤若寒蝉”。

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蝉被收录在第41卷虫部。上溯到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蝉已有记载了。蝉入药部位有蝉身和蝉蜕之分，李时珍记载古人多用蝉身，主要治疗脏腑经络疾病，而现在用的主要是蝉蜕。

蝉蜕主要有三大功效，第一是利咽喉，第二是息风止痉，第三是退翳明目。蝉蜕主要用于治疗皮肤疮疡、风热表邪的疾病，在临床上最常用于开嗓音、利咽喉。中成药黄氏响声丸、金嗓开音丸等，功效中都有蝉蜕的贡献。

除了蝉身和蝉蜕可入药以外，蝉花也是一味中药。夏天，雌蝉在产卵后，一般会在一周内死去。卵经过一个月左右孵化，幼虫会掉落地面，再钻入土中。幼虫在地下下的时间十分漫长，有的能在地下度过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。在土壤中蛰伏的蝉幼虫如果被麦角菌科的真菌感染，也会通过类似冬虫夏草成长的方式变成一种“蝉虫草”，入药为蝉花。早在宋代《本草图经》中便有蝉花的记载了，并配有生动的绘图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蝉花甘、寒，无毒；功效和蝉蜕类似，主治婴幼儿高热、抽搐、惊风。（《中国中医药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梅妻鹤子的隐士文化

王旭烽

北宋年间的杭州诗人林逋，字和靖，在孤山隐居，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孤高自傲，二十年不入城，被后世文人视为人生楷模、价值坐标。中国正统的士大夫，一向把香草美人喻为高洁品行的传统，从屈原的《楚辞》中就可以看出来。梅花尤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象征，所以历来咏梅、画梅之人不绝。林和靖在孤山，正是人格化了梅花，所以人花才两两相印，博得千秋清明。

林和靖的墓就在孤山北麓，墓碑一行字：“林和靖处士之墓。”这就是处士的含义了，一个一生中不曾做过一天官的士人。后来的知识分子，无论出仕还是未仕者，都崇拜林和靖的隐士风范。

说这个名叫林和靖的高士，从任何角度看，仿佛都应该从梅花与

他的关系缘起。说林和靖，必须在梅绽时刻，暗香浮动，月色黄昏，疏影横斜，这是林和靖的意境。其实年少时的林逋，也未必就是那么隐的。祖父林克己曾经是吴越钱王的通儒院学士，只是父亲早逝，家道中落。林逋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隐士，他对隐的认识也是在命运的颠簸中完成的。年轻时他也曾出游四方，结交官宦，吟诵些崇尚武功的诗篇。林逋结束漫游后，身心厌倦地回归钱塘。

他回归了山林，还开发建设了山林。首先就是植树造林“梅妻”，植梅360株，一株收入一日所用，又种松、竹、桃、杏、柿、梨，以及石竹、蔷薇、菊花、荷花，孤山终成“花果山”。同时，他又采药，种药，买药，捕鱼。一湖明月夜鱼归，水痕秋落蟹螯肥，林和靖辛劳得很。

梅尧臣比林逋要小整整36岁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极其深厚。北

宋天圣年间一个冬雪天，梅尧臣到杭州访林逋，他们在山中以枯叶和枝条燃起炉火，林逋拿出酒来，两人围炉畅饮，那种文人间充满山野之气的清新交往，让梅尧臣一生难忘。后来他曾说过：“林逋的人格，就像那高山中的瀑布泉水，越与他接近，越觉得他高尚可亲。”

天圣年间，已经是林逋在世最后的岁月了，范仲淹来拜访林逋，林逋年长范仲淹20多岁。一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，也是后来威震西夏的军事家；另一个则是避世的隐士。两个气质各异的人，在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共同背景下，却奇妙地成了忘年之交：一个钦佩另一个忧国忧民，一个赞赏另一个高风亮节，范仲淹赠了五首诗给林逋。二十年之后范仲淹以礼部侍郎的身份至杭州，又为杭州人民排忧解难。（《文摘报》）